

#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探索

##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陈 云

**【摘 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从学术史上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早有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之说,前者注重从“经济”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浅绿”思潮的表征;后者注重从“环境”的角度看经济,是一种“深绿”思潮的表征。但无论是“浅绿”A 模式还是“深绿”B 模式,它们最终都走向了极端,无益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然而,一种超越于 A 模式和 B 模式的升级版 C 模式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它是一种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而凝练出的“一体三面四驱动”模式。“一体”即广义上的绿色发展,“三面”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而“四驱动”则主要指作为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的驱动路径。该模式各维度是相互联系和交叉渗透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A 模式;B 模式;C 模式及其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sup>①</sup>。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积极探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是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题中之义。而其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现代化之间内在关系的问题。从学术史上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早有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之说,前者注重从“经济”的角度看环境,是一种“浅绿”思潮的表征;后者注重从“环境”的角度看经济,是一种“深绿”思潮的表征。但无论是“浅绿”A 模式还是“深绿”B 模式,它们最终都走向了极端,无益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内一种 C 模式的提出对于超越 A 模式和 B 模式具有重要启发,但其仍然存在一些可商榷的地方。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某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升级版 C 模式,对这种模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将更加有助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加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云,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州 35011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生态富民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3BKS106)的研究成果。

<sup>①</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3 页。

## 一、传统 A 模式与布朗 B 模式及其问题

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是当代美国著名环境思想家莱斯特·R. 布朗 (Lester R. Brown) 提出的,但 A 模式是其提出来加以批判而 B 模式则是其倡导的。布朗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一种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加以考量的 B 模式,对于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很有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布朗深切体会到其背后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他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翻番和经济增长六倍,我们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变得异乎寻常的大,我们向地球索要的已超出了它所能不断提供的限度”<sup>①</sup>。布朗详细阐释了我们的地球是如何的“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土壤受侵蚀、耕地在缩小,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这一切都表征着我们人类的“生态债即将到期”<sup>②</sup>。布朗认为,要偿还这一生态债,首先要认识到过去的发展模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模式。他指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就是一种“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模式,即所谓的 A 模式,指传统意义上以指数型经济增长为追求的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对大自然必然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正如其所言:“‘一切照旧’已经开始可以读成‘世界末日’了。”<sup>③</sup>传统 A 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注重经济的指数型增长,认为这是第一位的。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完全置之不顾,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绿色”意蕴的发展模式,只不过其“绿色”底色完全被对增长的追求所覆盖了。那么,为何 A 模式还要讲求一种“绿色”呢?其实,A 模式的“绿色”只是一种假象,其试图以一种虚假的环境经济“协同”来为经济增长服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 A 模式的话语基础更加倾向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它是“浅绿”思潮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内核、以自然资源依托为增长动力的传统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所以,在布朗看来,必须超越传统 A 模式,为此他提出了一种 B 模式。

何谓 B 模式?布朗说:“人类需要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模式——不妨就称之为 B 模式,以迅速重新安排轻重缓急,重组世界经济,避免经济的崩溃。”<sup>④</sup>布朗其实并没有明确界定到底什么是 B 模式,但是从其相关阐释来看,B 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旨在追求生态可持续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要求经济与环境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sup>⑤</sup>。换言之,B 模式的环境压力要求是实现零增长,它是一种强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其话语基础更加倾向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范畴,属于“深绿”思潮中以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后现代化发展模式。布朗认为这种模式的理念比过去任何设想都目光远大,其倡议在规模或紧迫性上也是史无前例的<sup>⑥</sup>。从 B 模式的现实架构上看,布朗着力从以下几点推进:一是描绘蓝图。布朗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评价 B 模式,认为 B 模式是“拯救文明的蓝图”,指出“B 模式是‘一切照旧’地执行传统模式的替代方案。它的目的是把世界领出通向衰弱和崩溃的老路,转而踏上使食物安全得以重建、人类文明得以长久维系的新途”<sup>⑦</sup>。二是设定目标。布朗提出了四个目标,即到 2020 年减少二氧化碳净排放 80%、世界人口稳定于 80 亿或者更少、消除贫困以及恢复地球的自

①[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林自新、暴永宁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

②[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第 4 页。

③[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起来,拯救文明》,林自新、暴永宁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 年,前言。

④[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第 17 页。

⑤诸大建、黄晓芬:《循环经济与中国发展的 C 模式》,《环境保护》2005 年第 9 期。

⑥[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起来,拯救文明》,第 18 页。

⑦[美]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起来,拯救文明》,第 18 页。

然体系<sup>①</sup>。这四大目标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消除贫困是最主要的目标,这个目标没实现就意味着将产生不稳定的人口结构,而人口结构的不稳定则意味着必将难以稳定气候,其结果便是地球自然系统将遭遇危机,这又必然反转过来影响人口稳定,从而使得贫困问题又进一步产生。三是建构模型。B模式的替代性方案具有全局性效应,究竟如何使这种模式真正落地,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变革,布朗提出了三种模型,即“珍珠港模型”“柏林墙模型”和“三明治模型”。“珍珠港模型”又称灾难事件模型,意指需要等到灾难性事件来临或发生时才作出某种行为方式的变革;“柏林墙模型”意指当权者未必支持某种变革,但其仍然会渐渐带来某种变革;“三明治模型”意指某种变革既有在下的草根阶层不断推进,又有在上的政治阶层充分支持。这三种模型相比较而言,“珍珠港模型”显然风险系数最高,其次是“柏林墙模型”,而“三明治模型”则是最优的方案或模型,这也是布朗在B模式探索中要重点推进的模型。四是“战时”动员。强调“战时”动员意味着B模式的探索或方案推进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扭转当前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严峻形势。布朗对此做了一个类比,他以美国珍珠港遭遇偷袭后的迅速反应为例指出,“美国进行了全面总动员,终于与别的国家一起扭转了形势,在历时3年半之后,领导盟军取得了胜利”<sup>②</sup>。布朗认为以B模式拯救文明的动员与二战期间美国的总动员在逻辑上是颇为相似的,如果能够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果断迅速的行动,那么对于化解当前的生态危机和经济泡沫并最终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现代化发展则指日可待。五是提出对策。在实践中探索B模式还需要积极应对各种现实挑战并提出可行性的具体对策。例如,布朗提出了推动照明技术革命、倡导零碳建筑、实现交通系统电气化、转向可再生能源、重新设计城市交通、让自行车重新回归城市、减少城市用水、改善棚户区居住条件、倡导人人有学上、积极提供医疗保障、救援失能国家、植树固碳、保护动植物多样性、修复土质、提高土地和水的生产力、提高环境污染税以及停建所有燃煤发电厂等对策。

对于布朗B模式而言,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A模式,其并不是以经济利益或经济增长为第一性的,自然或生态环境才是其切入的要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B模式的目标设定、模型建构还是对策提出,其本质表征着一种有别于传统A模式末端治理的始端治理,即B模式更加注重从一开始就杜绝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或从一开始就要提前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并给予及时治理,这一点与传统A模式完全相反。但是,布朗B模式也存在一些潜在性问题。一是这种模式具有浓厚的“大跃进”或运动式的色彩。全球生态危机形势日益严峻,探索一种优良模式来应对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对这种危机或挑战的应对切不可急于求成、不可“一刀切”,否则必将适得其反。布朗B模式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布朗提出应对这一挑战必须“进入战时动员”<sup>③</sup>,要像军事打仗一样速战速决,例如提出要在2020年前关停所有燃煤发电厂<sup>④</sup>,要以可再生能源取而代之。事实上,其叙事旨意没问题,但其节奏太快了,并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对于发达国家完全可以有这个要求,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和地区显然不能对其强加要求,否则又会陷入人口不稳、经济贫困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中。二是这种模式被认为必须由美国来带头推进,否则很难实现。按照B模式的“战时动员”逻辑,布朗认为,推进B模式的落地必须由美国来牵头,否则一切都难以奏效,他说,“使全世界采用B模式,需要美国带个头,否则是不太可能奏效的”<sup>⑤</sup>。如果布朗试图表达的意思是要求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应承担更多环境责任带头降碳减排则无可厚非,但布

①[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起来,拯救文明》,第18页。

②[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第93页。

③[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第189页。

④[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起来,拯救文明》,第82页。

⑤[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第189页。

朗的意思却认为美国是最有决心和能力来扭转局势的。其实,美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却总是“退场”或“虚情假意”,所谓“美国第一”才是他们所要坚定护卫的,其他一切都是在为这一霸权逻辑服务。所以,布朗 B 模式所谓带头推进的“美国期待”本质上是难以期待的。三是这种模式很可能陷入遏制经济发展或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困境中。布朗 B 模式的话语基础偏向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视域,是一种“深绿”思潮的发展模式典例,呈现出的价值观取向是生态中心论的。显然,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过程中,B 模式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于抬高大自然的地位而陷入自然赋魅的神秘主义境地,从而更加容易忘却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发展或现代化推进问题。

## 二、一种 C 模式的提出及其评析

基于以上,是否又存在一种能够超越于 A、B 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呢? 21 世纪初学术界已有一种观点非常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那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诸大建先生于 2005 年提出的 C 模式。诸先生意识到,传统 A 模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和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来推进,他认为“这种模式属于危险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环境退化”<sup>①</sup>,而布朗 B 模式则是一种长远的、理想化的方案,“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来看,要推行这个高方案的模式难度很大”<sup>②</sup>。基于此,诸先生指出,我们既要避免走上传统 A 模式的道路,也要防止走上布朗 B 模式的道路,我们应该探寻一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那就是 C 模式,如其所言,“既然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发展 A 模式,也不能立即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 B 模式,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中间路线’的模式适合我国? 为此,笔者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称 C(China)模式。”<sup>③</sup>从诸先生的相关论述中可知,C 模式本质上指向的就是一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他主要从生态效率和减物质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建构性阐释。

一是从生态效率的角度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多地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忽视了经济系统输入端的资源阈值和输出端的环境阈值问题,从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当前必须考虑实现从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生态效率提高的转换,在确保经济稳定有序增长的同时能够控制住资源阈值或环境阈值问题。正如诸先生所言,“循环经济关注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的提高。生态效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即 GDP 总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比值,它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分离关系(decoupling indicators),是一国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sup>④</sup>生态效率用公式表示,即生态效率(资源生产率)=经济社会发展(价值量)/资源环境消耗(实物量)。借鉴诸先生的相关阐释,在这个公式中可以呈现出四种情形的组合关系。

| 生态效率 | 组合关系      | 主要特点                         |
|------|-----------|------------------------------|
| 低    | 分子分母同步增长  | 经济增长,环境压力大                   |
| 渐高   | 分子增长,分母缓增 | 经济增长,环境压力相对低,二者开始出现相对脱钩      |
| 高    | 分子增长,分母零增 | 经济增长,环境压力呈零增长趋势,二者开始出现绝对脱钩   |
| 最高   | 分子增长,分母负增 | 经济增长,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

①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 年第 6 期。

②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③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④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诸先生认为,我国目前还处于第一种情形中,即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同步增长阶段,我们应以第三种情形为追求(实现绝对脱钩),但是就目前我国基本国情而言,第二种情形是比较稳妥的,也是我们现如今应该努力推进的,他说 C 模式强调的就是要走“资源环境消耗与社会经济增长相对脱钩的发展道路”<sup>①</sup>。

二是从减物质化角度看,就是要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消耗减少、确保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减少,但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发展。实际上,在诸先生看来,上述生态效率的演进情形便可揭示出循环经济的减物质化本质。生态效率的“低—渐高—高—最高”便是循环经济减物质化程度逐步推进过程。换言之,减物质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分阶段的。诸先生说:“通过发展减物质化的经济,并把建设循环经济型社会的目标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框架之中,到 21 世纪的前期(例如 2020 年左右)实现以较小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特别是各类固体废弃物)以达到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可能的。”<sup>②</sup>当然,这个过程的实现要分三步走或三个阶段,按照诸先生的划分,我们可用表格呈现如下。

| 减物质化阶段 | 阶段特点                       | 主要目标                                      |
|--------|----------------------------|---|
| 阶段 I   | 以高加工业以及消费增长为主              | 争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体增长速度能远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
| 阶段 II  | 21 世纪初以来物质消费趋于稳定(2020 年以后) | 实现某些资源消耗和固体废弃物的零增长,实现倍数 3 的生态经济效率         |
| 阶段 III | 未来“无重量”经济成为主流              | 争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相对于 21 世纪初有稳定减少,实现倍数 4 的生态经济效率 |

从阶段 I 到阶段 III 即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减物质化递推趋势,按照诸先生的观点,当前我国还处于阶段 I,发展经济或确保 GDP 增长仍然是头等大事,当然他也强调要争取“物质化”消耗或排放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就是 C 模式的题中之义,正如其所言:“C 模式也称 1.5—2 倍数发展战略,因为只有保证我国 GDP 的持续快速增长,才能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所以该模式将给予我国 GDP 增长一个 20 年左右缓冲的阶段,并希望经过 20 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的减物质化阶段。”<sup>③</sup>

无论从生态效率的提升还是减物质化的角度看,实际上二者都是 C 模式的一体两面问题,即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体,做到生态效率和减物质化程度的提高,既确保经济社会的发展或 GDP 增长,又实现降污减排,从而超越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当然,要真正意义上将 C 模式落地,还必须借助一些外在条件,正如诸先生所言,“实现 C 模式需要科技和政策双重保障”<sup>④</sup>。就科技而言,具体表现为产品工艺技术的减物质化改进、产品关键部件的清洁化替换、产品整体功能的生态化革新以及城市人居环境或交通设施的系统性空间规划等。就政策而言,具体表现在“三套机制和三种政策工具”,即政府行政体制、企业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参与机制及其相适应或相对应的规制或指令性政策、市场引导或激励性政策和社会组织或参与性政策。这三套机制和三种政策工具虽然在助推 C 模式落地的过程中的作用领域不同,但是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整体功能和效用是一致的。应该说,对于 C 模式来讲,本质上凸显出既主张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又强调生态环境的治理建设,而且还特别阐明了这个过程的推进是逐步的、分阶段的。所以,较之于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而言,C 模式显然更具辩证意义、更符合我国甚至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来说更具参考意义。

①诸大建:《从布朗 B 模式到中国发展 C 模式》,《沪港经济》2010 年第 6 期。  
②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③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④诸大建等:《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当然,诸先生所提出的C模式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我们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诸先生所提C模式的最早时间是200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或立论(当然也包括后期的某些论及)较之于新时代的相关论断来说显然存在某些出入,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契合时代精神。例如,诸先生所言的C模式是在当时中国还未脱贫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说,“我们从布朗书中得到的最大意义的借鉴,就是需要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原理的另一种模式——使中国这样的众多人口尚没有脱贫的发展中大国走上资源环境消耗与社会经济增长相对脱钩的发展道路,我称之为中国发展C模式。”<sup>①</sup>不言而喻,在“尚没有脱贫”的时代背景下论及C模式注定呈现的是诸先生所言的“1.5—2倍数发展战略”(用一番换两番),亦言GDP的快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不顾环境,而是以较小的环境代价换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其实在当时这也毋庸置疑。然而,关键是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人们向往更多的是美好生活需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如果还是沿用前述语境或叙事起点去阐释或运用C模式,显然难以辩证地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强调倍数发展战略,还是GDP的快速增长,其实都很容易模糊“协同性”界限。当然,诸先生所提C模式如前所述也是个阶段性推进问题,即强调“从2000年至2020年的中国发展”,适宜中国发展的是C模式。换言之,C模式所强调的GDP快速增长是有着一定时间缓冲的增长,即寄希望于20年左右的时间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在2020年后最终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减物质化阶段”。其实,这里有些含糊的地方,即2020年以后要不要增长,如要增长,较之于2020年之前是什么样的倍数增长,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实际上,诸先生所言C模式对于这个问题并未交代,换言之,C模式在2020年之前有其论说的合理性,但在2020年之后则有些语焉不详,原来的某些观点或许就难以适应时代要求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对C模式的思考。

另一方面,将探寻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的C模式仅仅定位于循环经济的叙事范式显然过于狭隘或不够有力。如前所述,C模式确实优于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即便B模式看起来会更加的“绿色”,但是这种模式应该更加适合发达国家,而不适合发展中甚至是落后的国家,因为发展中或落后国家还面临着要走向经济崛起或腾飞的现代化之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则应该为其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所埋下的环境代价去买单。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诸先生要提既顾及经济增长又强调绿色底色的中国C模式了,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实事求是的,适合不同国情的绿色发展模式,对于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诸先生所言C模式,给我们呈现出的似乎仅仅只是一种循环经济的叙事范式,如其所言,“为此,笔者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sup>②</sup>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循环经济的C模式对于超越传统A模式和布朗B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新时代的中国,如仅限于循环经济的叙事范式去比对性阐释或超越A模式和B模式显然发力不够,整体叙事缺乏大视野。而其实,循环经济的叙事范式主要针对的是末端治理模式而言的,其侧重于超越“资源—产品—废弃物—治理”的末端模式,建构出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治理—资源”的“资源到资源”的闭环式良性发展模式,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减少固体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说到底,这种模式集中倡导的是末端资源的循环利用,特别是一些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毫无疑问这对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对于资源或能源的输入端减排、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对于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或许就难以覆盖了,这就势必会遗漏这些领域或问题当中的

<sup>①</sup>诸大建:《从布朗B模式到中国发展C模式》。

<sup>②</sup>诸大建等:《C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绿色经济叙事,从而就无法从整体上(始端—中端—末端)或全过程的层面有力超越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全面审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缺憾。所以,对于 C 模式而言,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再作拓展性建构和完善,使得一种能够超越于 A 模式和 B 模式的适合于当代中国的 C 模式实至名归,切实符合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遵循。

### 三、对 C 模式的拓展性建构及其思考

C 模式既主张经济的稳步增长,又强调生态的治理建设,为超越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打开了缺口、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模式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 C 模式的某些立论或观点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很有必要对 C 模式做进一步的拓展性建构,以呈现出更具时代感召力的新时代 C 模式,从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辟更多路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工程,而现代化也表征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组构要素的整体性或位序性进步状态,因此我们看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能极端化、单一化甚至以偏概全,而应坚持整体性战略思维,要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分层次分情况把握二者的交融共进。因此,如何从模式层面上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问题,我们显然要避免陷入传统 A 模式和布朗 B 模式的困境,也不能简单拘泥于 C 模式的循环经济叙事,而应该构筑重点突出、形式多样、轻重缓急和布局相对合理的升级版 C 模式。在此,我们拟对升级版 C 模式作“一体三面四驱动”的拓展性建构。

“一体三面四驱动”即“一个总体、三大界面、四种驱动”。“一个总体”指的是广义上的绿色发展,“三大界面”主要指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而“四种驱动”则主要指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这三大向度共同构成升级版 C 模式的拓展性样态。那么,这三者之间到底呈现出何种关系或内在逻辑呢?从宏观意义上看,我们将此概括为“定向—展翅—助力”之六字逻辑理路。

“一个总体”主要是一个总的定向问题,我们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本质可以看作一个广义上的绿色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发展就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问题,是一个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质量优化或进步的状态,这与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同样,绿色所揭示出的也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诉求或基本内核,我们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黑色”文明,要还现代工业文明于“绿色”底色。因而,把现代化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两头挑起来,寻求二者协同推进的着力点或总体方向,本质上就是追问绿色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把脉定向,如果这个问题没定位好,那么后续叙述就很难成立。

“三大界面”主要是基于定向意义上的展翅问题,也就是说,从广义的绿色发展视角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必然要打造腾飞之翅,而且这种翅膀并不是单向覆盖的,而是多重链接的,在此我们将其翅膀概括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无论是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还是绿色经济,它们实质上都属于绿色发展的范畴。正因为它们本质上既是“绿色”的又是“发展”的,所以这必然构成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坚实之“翼”。

“四种驱动”则主要指“定向展翅”基础上的助力问题。我们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质上追问的是一个广义的绿色发展问题,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三大界面”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为此已展开了伟力之翅,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如果缺乏了针对不同情况而应该作出的调速换挡等不同动力切换,那么结果将很容易出现过度的绿色和盲目地发展等问题,从而严重影

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要在“定向展翅”基础上做到有效助力,我们提炼出了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和生态试验区引领这四条路径,旨在针对不同的区域结合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功”,实事求是地为生态添“绿”,为发展赋“能”。这就是我们对升级版C模式“一体三面四驱动”所做的拓展性建构的基本逻辑理路。

基于以上思路分析,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到“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再到“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生态试验区引领”这三大向度以其自洽逻辑从整体上构成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在此,我们拟对这一模式或框架再作进一步诠释或说明。

首先,关于绿色发展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绿色发展主要指一种广义的绿色发展,其构成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主干或主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sup>①</sup>从中可知,绿色发展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题中之意,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当然,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必然还涵盖着其他一些子概念、子脉络和子机制等等,但只要能做到既在保证绿色中促进发展,又在促进发展中保证绿色,这便是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最好诠释。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讲的“浅绿”发展和“深绿”发展都不是我们这里讲的绿色发展之意,因为那两种发展走向了极端,必将陷入人类中心论或生态中心论的困境,最终无益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增效,我们这里讲的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发展。

其次,关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问题。这三种经济形态都属于绿色发展的范畴,共同追求着一种低消耗、低排放以及低污染的现代化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三者又有所区别,循环经济旨在物质能量或资源的闭环流动及使用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其着眼于解决资源危机问题,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低碳经济旨在技术创新或新能源开发的过程中减少高碳能源的消耗及其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绿色发展,其着眼于解决气候(或能源)危机问题,从而建设气候舒适型社会;绿色经济旨在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以实现绿色发展,其着眼于解决产业结构性危机问题,从而建设产业环保型社会。当然,无论是解决资源危机、能源危机还是产业危机问题,其实,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本质上在各自的功能发挥和生态经济效益的产出上都是互为交叉和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并无天然的界限,只是它们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有各自领域的重点突破方向而已。

最后,关于“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生态试验区引领”的问题,实际上旨在从更加特殊或具体的场域对绿色发展的整体性联轴驱动、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节奏性振翅驱动进行探索描述。绿色发展是“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然而,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一体三面四驱动”问题,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出当前实现绿色发展的多轮驱动轴,否则很容易陷入宏大叙事的话语阐释困途,最终引发“一刀切”的现实盲目性。换言之,绿色发展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体”,那是不是意味着为了这一“体”就在全时空领域打造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之“翼”呢?显然,这必然要综合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的人口地理状况、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等具体情况,要在不

---

<sup>①</sup>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5页。



同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最强劲的驱动力,我们在此提炼的“生态现代化推动—生态致富路开辟—生态经济带贯通—生态试验区引领”这四条路径便是针对不同时空区域的多轮驱动力,具体而言,可作如下阐释。

一是生态现代化推动,即着重依托雄厚的财政资金、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经济现代化力量来驱动区域经济结构生态化调整或能源技术体系的绿色化升级,从而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类型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问题。生态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要赋予现代化进程以绿色意蕴或实现生态转型。不可否认,现代化进程确实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否定现代化,更不能从反现代化的立场去拯救生态系统,因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反现代化的生态之路走不通。我们应该立足现代化这个时代语境,从环保技术创新、绿色金融赋能、环境政策推进、生态法治建设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增效。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生态现代化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而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显然,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某些发达省市的绿色发展问题,我们应该侧重于以生态现代化的力量来推动,因为这些地区的现代化步伐迈得较快(当然环境问题或多或少也不可避免),但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还是非常可观或成熟的,因此在条件具备且完全也有必要的情况下,实事求是抓重点,积极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则尤为关键。

二是生态致富路开辟,即着重依托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内生性禀赋力量来驱动绿色发展,特别是注重将区域劣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造出能够满足更大市场需要的生态产品,让百姓走上现代化的生态致富之路。不言而喻,生态致富路开辟的动力来源于特殊的自然禀赋优势,从空间区域看,我国中西部某些省市地区特别是大西南、大西北片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地区较之于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地区而言,地貌形态以山区分布居多,交通不便,整体经济水平更是存在一定差距,所以要走生态现代化之路的后劲会稍显不足。然而,这些地区水资源、森林资源、气候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却十分丰富,看似充满山区劣势的地方实为大自然的宝藏,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利用本土自然禀赋优势,最大限度激活大自然的生态价值,开辟一条生态致富之路将更加契合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山区地带的绿色发展前景。当然,生态致富路的开辟是一个系统化和复杂工程,要实现本土自然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首先就要勇于冲破思维固化的藩篱,以改革创新突破瓶颈制约,不断寻求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要以系统思维推进山区自然资源的整体联动开发,推动山区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秉持“共建、共创、共享”的思路,推进山区特色资源深度融合,活化利用传统村落、秀丽山水等沉睡资源,打响山区宜居宜游宜业的新品牌等,为实现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弯道超车”不断激发绿色动能并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三是生态经济带贯通,即着重依托国家“江河”重大战略顺势而为,全面贯通中西东部核心省域绿色发展的总体脉络,以战略远见和整体思维串联推动全流域经济社会大发展和生态环境大保护。“江河”战略主要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习近平先后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sup>①</sup>,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

---

<sup>①</sup>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08页。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sup>①</sup>,并认为“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sup>②</sup>。从本质上看,长江、黄河流域均属于贯穿我国内陆东西走向的两条重要生态经济带,它们所涵盖的广阔省域空间和庞大经济体量“分别包括了长江流域的11个省市和黄河流域的9个省区以及我国人口总量的70.3%与经济总量的66.5%”<sup>③</sup>。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依托并推动实施国家“江河”重要战略,对于在长江、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各省市之间形成一个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大格局并联轴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

四是生态试验区引领,即着重依托我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比较优势与前瞻做法,形成立体化、有区域特色和可复制推广的绿色发展模式。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明确选择了以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作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其实,这三省具有鲜明的空间特征,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分别隶属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选择这三省作为我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在某种意义上可反映出我国东中西部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各自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释放出了巨大的“试验田”效应,对于其他省份避免陷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并更加充分地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福建为样板,南平的“生态银行”做法、三明的“福林贷”和“林权支贷宝”做法、永春的“三级市场”改革以及连江的“政府+企业+金融+渔民”的生态产品运作模式等在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以江西为样板,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绿色金融改革、流域生态补偿、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价值转化以及河湖林长制改革等均走在全国前列,而江西绿色发展的“靖安模式”“寻乌经验”以及“资溪经验”更是成为了全国典型。以贵州为样板,率先出台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生态文明地方性法规,率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率先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完成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禁捕,率先出台生态扶贫专项政策,在石漠化治理中已形成“晴隆模式”“顶坛模式”“关岭模式”“毕节‘五子登科’模式”的贵州经验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福建、江西和贵州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无论在国土空间科学开发、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绿色发展评价导向还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层面其实都能够发挥出先导性、示范性和引领性效用,对于协同推进各省域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一体三面四驱动”作为C模式的拓展性建构形态,其中的三大模块或三大向度是相互联系和交叉渗透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其以更加系统化、时代化和多样化的叙事超越了以往C模式单一化叙事,无论是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还是绿色经济,在这个社会(生态)大系统中都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叙事范式,只有形成合力和共同发力才能更加有利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其聚焦于新时代的绿色发展问题,既注重“发展”的紧迫性和高质量性,又强调“绿色”的全过程融入性和全方位显示度,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四轮驱动力”,从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陈 雪)

①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42页。

②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13页。

③鄒庆治:《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 **Building a Mode of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 Exploration by Review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CHEN Yun

**Abstract:** The crucial discours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aises a challenge in addressing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history, two modes of thinking on this matter have emerged: the traditional Model A and Brown's Model B. The former scrutinizes the environment from an "economic" standpoint, representing the "light green" trend of thought. In contrast, the latter examines the economy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embodying the "deep green" trend of thought. However, both the "light green" Model A and the "deep green" Model B have ultimately veered towards extremes, hind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 upgraded Model C, surpassing Models A and B, proves to be more rational and realistic for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model, denoted as the "one whole, three interfaces, and four drivers" model, is derived from our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notion of "one whole" signifies comprehensive green development, "three interfaces" involves circular economy, low-carbon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while "four drivers" predominantly include pathways such as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 opening of an ecological road to prospe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cological economic belt, and the leadership of an ecological pilot zone.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is model are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influential, forming an integrated whole that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odel A; model B; mode C and its upgrades

**About the authors:** CHEN Yun,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